

被“美化”的殉道：三岛由纪夫《忧国》的自杀书写与迪尔凯姆理论的对话

张文铎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吉林 长春 130022

摘要：本文借助迪尔凯姆的自杀类型理论，剖析三岛由纪夫《忧国》中武山中尉与妻子丽子的自杀书写。研究发现，二人的自杀行为兼具利他型与宿命型双重属性，二者既存在异质性，又在叙事中形成了辩证统一关系；文本的美学建构突破了迪尔凯姆的社会学阐释边界，却因极端文化防卫立场产生意识形态异化。本研究为《忧国》的解读提供了社会学视角，也揭示了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下过度社会整合与道德规范失衡对个体生命的操控逻辑。

关键词：三岛由纪夫；《忧国》；迪尔凯姆；自杀书写；意识形态异化

Beautified Martyrdom: The Suicide Writing in Yukio Mishima's *Patriotism* and a Dialogue with Durkheim's Theory

Zhang Wenduo

School of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Jilin Changchun 130022

Abstract: This paper draws upon Durkheim's typology of suicide to analyze the suicide writing of Lieutenant Takeyama and his wife Reiko in Yukio Mishima's *Patriotism*.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ir suicides posses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both altruistic and fatalistic suicide, exhibiting heterogeneity while forming a dialectical unity within the narrative;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the text breaks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Durkheim's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yet generates ideological distortion due to its extreme cultural defense stance. This study offer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for interpreting *Patriotism*, and also reveals the manipulative logic through which excessiv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excessive moral regulation operate upon individual life under militaristic ideology.

Keywords: Yukio Mishima; *Patriotism*; Durkheim; Suicide writing; Ideological distortion

0 引言

自杀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中极具精神重量的母题之一。日本战后文学代表作家三岛由纪夫（みしまゆきお，Mishima Yukio，1925-1970）的创作始终围绕生死与美学展开，其1961年发表的小说《忧国》是其中死亡书写、美学理念与政治思想最集中、也最具争议的文本。《忧国》以“二·二六”事变为背景，讲述中尉武山与妻子丽子因忠义两难而分别切腹、自刎殉死。三岛借此构建“死与美合一”的美学体系，其本人后续以相似方式自杀，更使叙事获得了现实重量。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在《自杀论》（*Le Suicide*）中认为，自杀源于社会整合（个体与集体的联结强度）与道德规范（社会对个体的约束强度）两大维度的失衡，并将自杀分为利己、利他、失范、宿命四型^[1]。以下主要探讨《忧国》中武山与丽子自杀行为的类型归属、差异与统一，及美学建构的突破与意识形态异化。

1 迪尔凯姆理论下《忧国》自杀行为的类型界定

利他型自杀源于社会整合过度，宿命型源于道德规范过度；《忧国》中二人的自杀同时兼具这两种特征。利他型自杀可分为义务性、非强制性和强烈利他主义三种亚型，对应二人自杀的不同驱动力。

义务性利他主义自杀源于社会强制给个体带来的义务性约束。对武山而言，这种义务性约束来自于他对军国主义军人伦理的认同与恪守。近卫步兵中尉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生命不属于个人，而是隶属于天皇与日本军国主义集体。兵变发生后，武山面临忠义两难：讨伐则背弃同袍，违抗则愧对天皇。这套伦理体系为他设定了不可推卸的义务——唯有以死守住军人的身份合法性。对丽子而言，义务性约束来自于日本传统妻道伦理的规训。小说中，武山在新婚首夜便对丽子做出训诫：“作为军人之妻，应随时想

到丈夫的死”，丽子则取出陪嫁的佩剑，完成了对这一义务的接受^{[2]255-257}。这种伦理规训为其与丈夫共死的行为提供了社会伦理层面的合理性支撑。

武山的自杀同时是非强制性的，他发自内心的对皇道派军国主义信仰的认同，将这份被动的义务转化为了主动的价值选择。丽子的自杀则属以家庭为单位的强烈利他主义，对她而言，丈夫武山既是夫妻感情共同体的中心，也是军国主义大义的具象化载体；她的主动赴死本质是通过献祭生命以完成与丈夫的终极合一，这正是强烈利他主义自杀的呈现^[3]。

同时，二人的自杀也带有宿命型特质。武山被军人伦理逼入“生存即违背身份伦理，赴死方能守住忠义”的绝境。丽子的殉死则绑定于“军人之妻”的身份，其遗书中“军人之妇，终有此一日”的表述也表明，她早已清晰认识到这一身份为她预定的结局——除了随丈夫殉死，她没有任何符合“军人之妇”身份的生存选项。

军国主义体制既通过高度社会整合催生利他型主动赴死，又通过过度道德规范封锁生存路径，形成宿命型被动强制，使殉死成为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必然悲剧。

2 武山与丽子自杀行为的异质性与辩证统一关系

二人的自杀虽同有利他与宿命属性，但也存在深刻的异质性，并在军国主义框架中形成辩证统一。

精神原点方面，武山的自杀精神原点是信仰绝境下的义务性殉道，对他而言，自杀是维护集体价值、维系军人身份合法性的唯一选择，其遗书仅一句“祝皇军万岁！”印证了死亡的意义锚定在由国家集体场域^{[2]260}。丽子的自杀精神原点则是妻道下的情感性追随。她本身并未陷入政治绝境，死亡对她而言也并非必须履行的义务，而是对丈夫的“悲叹、苦恼、全部思考”的感同身受为驱动力的主动奔赴，“马上就能进入丈夫的世界，品味他信仰的大义的苦涩与甘甜”^{[2]255-261}。其精神原点锚定在微观的家庭共同体。

主体自主性方面，自杀的全过程均由武山一手策划，丽子只是知情者与配合者。武山虽拥有选择的主动权，但仍将自杀作为人生的唯一解，其主动性贯穿始终。丽子的自杀则是以丈夫的选择为前提的有限主动奔赴，她的选择始终建立在武山的死亡决定之上。丽子虽主动提出“让我同您一道吧”并得到许可，表达的是陪伴而非独立决策^{[2]264}。

个体体验方面，武山面对死亡经历了从懊恼挣扎到决绝承受肉体痛苦的过程，死亡对他而言是以极致意志力承

受痛苦为代价方能完成的信仰使命。而丽子面对死亡则始终平静欣然，甚至充满幸福的期待。被告知剖腹决定后，她反而因即将与丈夫一同赴死而“心中愈加充满剧烈而狂热的幸福”，死亡对她而言是奔赴与丈夫精神合一的幸福终点的必要过程^{[2]260}。

尽管存在分野，二人的自杀仍形成了精神上的统一。这种统一首先体现在自杀前的性爱交融中。通过性爱，武山实现了“肉欲与忧国至情的浑然一体”，丽子则借此完成了对丈夫精神世界的融入^{[2]268}。这种统一也体现在死亡的仪式化书写中。近代以来，武士道被作为展示“大和魂”（やまとだまし，Yamato-damashii）与日本民族优越性的载体而存在^[4]，其中的剖腹本身就具有极强的仪式性。武山严格遵循武士道剖腹的流程，从剃须整妆、书写遗书到一字切腹，全程庄重规整；而丽子的自刎同样遵循了节妇殉死的伦理规范。二者异质的死亡在统一的仪式化叙事中达成了共振。此外，二人的自杀在价值层面也形成了双向滋养的共生关系：武山的殉国使丽子的情感追随得到了价值升华，使其从单纯的殉夫节妇成为与丈夫一同坚守大义的“烈妇”；丽子的殉死也为武山的殉国注入了情感与温度，使其死亡叙事更具备美学张力，共同构成了军国主义信仰的完整意识形态闭环。

武山与丽子的自杀选择看似对立，却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忧国》自杀书写的内核。而二人自杀的异质性，恰恰构成了反思三岛死亡美学意识形态异化的重要依据——三岛通过美学赋魅，抹平了主动殉道与被动规训的差异，将悲剧包装为崇高美学实践。

3 美学建构对迪尔凯姆自杀理论的突破与意识形态异化

迪尔凯姆将自杀视为社会事实，排除个体情感与精神追求。三岛的书写则呈现主体性因素，突破了社会学边界，却因极端民族主义产生了异化。

这种突破首先体现在对切腹自杀的仪式化美学建构上。三岛的文本中，切腹则成为了一种与传统物哀美学融合的“表演艺术”。三岛用大量笔墨描摹赴死前的筹备细节，赋予整个过程极致的庄重感。他更将自身“太阳与铁”式的美学主张——只有如希腊雕像般充满力量感与古典美感的肉体，才能承载起浪漫主义式的、充满戏剧张力的“死语”，融入对武山肉体的书写^[5]。武山“麦田般的光辉的肌肤，每一块肌肉都露骨地凸现着清晰的轮廓”，这种剥离了孱弱与瑕疵的古典肉体，在三岛看来是死亡美学的基底——唯有如此完美的肉体，才能让切腹这种惨烈的死

亡方式升华为兼具浪漫主义美感与戏剧张力的美学仪式。同时,三岛也剥离了切腹的狼狈与绝望,中尉“陶醉于一种奇妙的情感之中……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甘美情调”,即便是切腹最惨烈的过程,文本也始终以肃穆的笔触书写:“震颤的刀尖终于触到了完全外露的咽喉……他猛然纵身扑向刀尖,刀刃穿透了他的脖子”^{[2]280-288}。在三岛的书写中,切腹比起单纯的殉道,更是以毁灭肉体为途径来抵达美的永恒路径。

三岛同时也将自杀前的性爱书写作为自杀叙事的重要载体。如上文所述,武山在沐浴时深感“自己肉体的欲望和忧国的至情”浑然一体,性爱过程中“还没有感触到的死之痛苦”淬炼着二人的快感,结束后二人认定“那种无上的欢乐都永远不会再度出现”^{[2]276}。这场性爱抵达了生命快感的巅峰,死亡不是快乐的终结,而是快感的催化剂与定格。随后中尉选择让丽子见证自己的切腹而非先杀死妻子,这一选择基于信任的托付,更突出了个体间的情感羁绊。这种将爱欲与死亡深度融合的书写,赋予了自杀行为丰富的个体心理与情感内涵,突破了迪尔凯姆将自杀完全归因于社会结构的局限。

然而,三岛的美学建构因其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产生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异化。迪尔凯姆的理论揭示了极端社会整合对个体生命的操控与吞噬,而三岛的美学建构却用死亡之美掩盖了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生命的规训与异化。然而,三岛用美学掩盖了意识形态暴力。迪尔凯姆揭示的是社会整合对个体的吞噬,三岛却将被迫殉死塑造成“至福的物语”,完成了对军国主义自杀的美学合法^[6]。所谓“至福”,亚里士多德阐述其为“比最高的善更伟大、良好、神圣的幸福”^[7]——三岛正是将这种殉道义务重构为超越世俗的最高善,用被美学赋魅的“至福物语”抹去了迪尔凯姆所揭示的社会悲剧,让被意识形态裹挟的被动死亡被包装成个体凭借自由意志抵达终极幸福的神圣选择,完成了对军国主义自戕行为的美学合法化建构,并让他的死亡美学在某种意义上沦为了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

4 文本之外:社会语境解读与现代性反思

迪尔凯姆理论视角下,《忧国》背后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结构危机与战后转型期的集体精神困境。

迪尔凯姆指出,大规模的利他型自杀必然出现在社会整合过度、集体意识形态完全压倒个体价值的社会中,如军队。战前的日本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军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天皇制和武士道精神等一系列制度与规范,完成了对全社会的过度整合,个体的生命价值完全依附于国家与集

体,武山夫妇的自杀正是这种过度社会整合的必然产物。

《忧国》创作于1961年,三岛则在1970年以近乎复刻文本的切腹方式结束生命。这一行为绝非偶然,他曾写信说:“在今后的人生中我可能会演出一些蠢行来……”^[8]

三岛“对天皇的思想和感情,正像一把双刃的剑”^[9]。随着日本战败,社会为西方文化所渗透,象征天皇制取代了战前的专制天皇制。这致使日本原有的文化认同与道德体系瓦解,社会坠入的失范状态^[10]。在三岛看来,象征天皇制的弊端在于割裂了天皇与日本本土文化的关联,使日本失去了文化共同体的象征。因此他极力主张恢复天皇作为“文化共同体”最高象征的地位,重新将天皇塑造成维系日本本土文化纯粹性、凝聚民族精神的核心符号,所谓“保卫日本文化,势必归结到保卫天皇”^[11]。

但三岛的文化防卫理论并未止步于文化层面,反而迅速转向现实政治实践。他将天皇文化象征地位的恢复与政治诉求绑定,主张“复活‘文武两道’(ぶんぶりょうどう, Bunbu Ryōdō)”这个古老的名目^[12],认为唯有强健肉体、恢复武士道的行动精神、重建日本军事力量,才是保卫日本文化的先决条件^[12]。这一思想悖论使其文化防卫论从守护本土文化的主张异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成为其试图复辟战前军国主义的理论外衣^[13]。

三岛的创作与现实选择,内里是对战前过度社会整合状态的怀旧与回溯。他通过武山与丽子自戕的赞美完成对“二·二六”事件青年将校之死的文学“救济”,重建集体价值以填补战后社会的失范真空^[14]。但这种回溯最终走向了极端——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忧国》中利他型自杀的现实复刻,也成为了战后日本社会失范状态的一个悲剧性注脚^[15]。

《忧国》的自杀书写表明:过度社会整合或道德规范都会吞噬个体生命价值。极端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规训永远以吞噬个体的生命价值为代价;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也必然会引发集体的精神困境。个体的生命价值既不能消融于集体之中,也不能脱离社会的联结,唯有在社会整合与道德规范的平衡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存意义。

5 结语

《忧国》中武山与丽子的自杀,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下社会整合与道德规范双重失衡的极端产物。武山献祭于集体价值,丽子殉身于妻道规训;二者在精神原点、主体自主性与死亡体验上异质,却在仪式化死亡与性爱交融中达成辩证统一。三岛通过死亡与爱欲的美学建构,突破了迪尔凯姆纯社会学阐释的边界,却也用“至福物语”掩盖

了意识形态暴力,将被迫殉死包装为主动的神圣选择,使死亡美学沦为军国主义的合法化表达。

《忧国》里的自杀从来不止是一场虚构的文学叙事,它更让我们看到极端意识形态中每个个体都要面对的困局。而对这一文本的重读、拆解与反思,更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对社会整合与道德规范平衡的坚守——这也是跨越时代与文本的永恒命题。

参考文献:

- [1] 埃米尔·迪尔凯姆. 自杀论[M]. 冯韵文译.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6:294.
- [2] 三岛由纪夫. 鲜花盛开的森林·忧国[M]. 陈德文,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21:255-257.
- [3] 曹天赐. 试论三岛由纪夫作品中的“大义”与女性[J]. 名作欣赏, 2021(06):100-104.
- [4] 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M]. 张俊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5] 三岛由纪夫. 太阳与铁[M]. 唐月梅, 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21:19-20.
- [6] 三岛由纪夫. 1965 年电影《忧国》官方解说词、首映访谈及创作手记[Z]. 1965.
- [7]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八卷(典藏本)

[M]. 苗力田, 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23.

[8] 涩泽龙彦. 三岛由纪夫追记[M]. 邹双双,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78.

[9] 叶渭渠, 唐月梅. 日本文学简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256.

[10] 张东. 制宪权视角下象征天皇制与近代天皇制间的断裂与连续[J]. 日本文论, 2019(02):99-121.

[11] 唐月梅. 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288.

[12] 唐月梅. 关于三岛由纪夫“武道”新论[J]. 日本研究, 1994(02):59-64.

[13] 张慧佳. 个体焦虑与时代焦虑的交光互影——三岛由纪夫怪异美学观的深层心理结构[J]. 长沙大学学报, 2012, 26(01):89-91.

[14] 澤田文男.「三島由紀夫の小説『憂国』の文学性」[J].『研究紀要』, 2013:58-59,93-119.

[15] 黄亚萌, 徐香君. 论《忧国》中至福之死[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5(01):211-212.

作者简介: 张文铎(2005-), 男, 汉族, 吉林长春人,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